

君主官僚制国家、官僚化浪潮 和现代国家破晓*

——秦朝国家形态的内涵、历史定位和世界意义

黄 涛**

【内容提要】 公正阐释秦朝国家形态的内涵、历史定位和世界意义是进行国家基础理论创新、重建世界政治史的重要途径，也是找回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和历史使命的重要方式。秦朝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成熟的天下型国家，是古代东方最重要的国家形态，比碎片化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更持久、更具普遍性，也比古罗马更好地处理了直接统治和民族整合问题。它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问题，是当时世界并曾长期是世界史上最先进的国家形态，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家形态和社会治理范式供给。秦朝拥有古代世界最彻底的平民社会，并在世俗化、直接统治、常备军制度、文武关系、国家形态延续性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状态，是世界史上第一波官僚化浪潮最高峰，也是最早翻越国家机器现代化、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两座珠穆朗玛峰的国家。但秦朝并未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仍属古代国家。秦朝国家形态不是中国和世界的负资产，而是世界中国化的起点，深度塑造了世界政治文明。

【关键词】 天下型国家 国家形态革命 国家构建 超大规模国家 世界中国化

* 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人评审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 黄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周秦之变的最重大成果,是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朝代。毛泽东曾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百代都行秦政治”。^①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何炳棣认为:“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②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在中国延续2133年,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国家形态和传统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并传播到周边国家,决定性地塑造了古代东亚的格局,对世界史特别是世界政治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受到东方专制主义、亚洲停滞论等思潮影响,中外学者将秦朝建构为黑暗专制、残暴不仁的恶魔,将1912年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描述为专制主义。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不再盲目贬低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要真正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需要公正理性地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形态史、政治史,毕竟中华文明是国家中心型文明,政治一直对整个国家有重大影响。而要正确认识中国国家形态史、政治史,秦朝国家形态极为重要。当前,关于秦朝的研究不少,但基于国家理论构建视角和世界历史视野探讨秦朝和秦朝国家形态的论著并不多。历史学者李学勤深刻指出,秦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才能认知秦朝的价值和意义。^③

当然,秦朝国家形态并不简单等于秦朝,它包含产生于秦朝的国家形态,也包含在秦朝奠基但在后世中国王朝有所发展的国家形态。虽然汉、唐、宋、元、明、清的国家形态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层面,但这种差异性还不足以破坏这种国家形态的整体结构和本质属性并使得其蜕变成一种新国家形态。

一 破旧立新:国家形态概念的本土构建

当前,国家理论乃至政治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和理论都来自西方,必须反思和正视其本质、意义和不足,克服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基于中国历史和

① 苏桂主编:《毛泽东诗词大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② 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96页。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实践“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①，最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理论体系、新的话语体系，否则我们的国家理论研究始终只是在西方理论大树上“修枝剪叶”。正如政治学者王裕华指出的：“思考国家建构的时候，应该避免照搬从欧洲经验抽象出来的理论，应该想一想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能不能够去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非常线性的国家建构过程无法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新的视角。”^②

（一）既有国家理论的来源、本质和不足：一个简要叙述

当代政治学有政体、国体、国家形式、国家模式、国家发展模式、国家本质、国家类型、政治制度、政府形式、政治体系、统治、政府、政权等概念，也有政体理论、现代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民族国家理论、国家起源理论、国家类型理论、革命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构成了人类认识国家的基本工具，具有重要意义，但至少存在三大明显倾向和不足。

一是发端于古希腊城邦的实践，本质为欧洲地方性政治实践的总结，未能照顾到其他地区的国家实践和历史。无论是国家起源与演变理论、现代国家理论，还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的历史分期，总体上都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构建的，西方民族国家似乎成为现代国家的唯一模式。二是以政体为中心，对于国家构造的整体性考虑不足，比如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和阶级结构、经济形态在国家形态中的作用等关注不足，从而使得国家概念经常片面地等同于政体、政府、政治制度。三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所谓的希腊自由—东方专制进而是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高度意识形态化，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重视国家的形式大于国家的实质，对国家治理绩效重视不足。今天的西方在图谋削弱和遏制中国时依旧使用自由—专制话语，首先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妖魔化”中国，来掩盖其维持霸权地位和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核心意图。

这就决定了如果要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国家理论，就必须审慎选择和使用概念、方法和理论，确保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具有中立性或者中国主体性，否则从一开始就会产生巨大偏差和局限。

^①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6 页。

^② 王裕华：《中国的国家兴衰：从盛唐到晚清》，《中国政治学》2020 年第 4 辑，第 6 页。

(二) 中国“国家性”和国家形态概念的本土化

1. 中西方国家“国家性”的差异。中国是国家中心型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国家性”十分鲜明,承认和认识这种“国家性”是展开中国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中西方国家差异性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国家观不同。在中国,国家不但未被视为社会的对立物,而且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善,居于整个文明的中心。“至少从孔子所处的时期以来,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①这和西方文化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的根本逻辑有本质区别。第二,国家演变史不同。西方国家演进是不同民族走马灯式走上历史舞台的结果,大致遵循城邦、帝国、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路径。中华文明具有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总体上属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国家形态演进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内生逻辑。

2. 国家形态的定义。基于上文指出的现有国家概念和理论的不足,本文选择“国家形态”作为描述国家整体构造、揭示国家本质和形式的核心概念。该概念主要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中文翻译,英文政治学更多使用政体、国家形式、国家类型等概念,极少使用国家形态概念。当前,国家形态含义尚未完全固定,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因而其更具中立性和弹性,可以赋予更强的本土性,作为对国家结构和构造进行整体性分析的、契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重要概念。^②

历史学者卜宪群认为,国家形态主要就是指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内部构造形式,国家形态研究还要包括对国家形态的外部表现、内部构造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研究。^③笔者认为,国家形态包括国家的内部构造和外部形状,可以视为由构造国家的原理、国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综合在一起呈现的总体性构造、特质和样态。关于国家形态构成,哲学学者王长江、郭强指出:“国家政治权力的组织形态、生存空间的聚合方式、政治认同和社会观念是国家形态的

①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② 关于国家形态概念和理论的历史回顾和系统阐释,囿于本文篇幅,笔者将另文阐释。

③ 卜宪群:《古代国家形态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1页。

基本构成和体现。”^① 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的经验和国家形态的整体性，同时为克服政体中心主义的局限，国家形态应该包括立国原理、国家基本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和阶级结构、经济形态五方面要素。此五方面要素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内涵后文将分别阐释。国家形态是各族群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思想观念斗争、博弈、妥协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观念、经济、地理、制度和历史基础上的选择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观念、经济、地理、制度和历史基础“自动推导”的产物。历史、观念、利益、经济、地理、政治家、阶级关系等因素在国家形态形成和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形态是人类社会的“芯片”。强大有效先进的国家形态的出现，是政治演进、社会进化的最重大成果，往往会深刻影响、塑造乃至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甚至会传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现象。秦朝国家形态就是如此。

（三）国家形态与政体、国家类型、国体等概念的关系

1. 与政体的关系。政体是政治学的基础性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政体就是对城邦中的各种官职尤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官职的某种制度或安排。政府在城邦的任何地方都有管辖权，而政体即政府。”^② 政体理论深刻影响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前文指出的现有国家理论的局限也是政体理论的局限。政体理论还有一个不足，也就是高度类型化、理想化，既忽视不同政体下国家运作的相似性，也忽视相同政体之下国家运作的差异性。国家形态概念除了将政体纳为其组成部分外，还将社会和阶级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要素纳入，以克服政体理论的唯政治制度倾向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2. 与国家类型的关系。国家类型亦是政治学的基础性概念，主要指“按一定标准对国家的分类”。^③ 有学者指出：“政体和国体的分类及构造问题，是现代国家类型学的主要谱系”。^④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六种经典政体类型对应六种不同

① 王长江、郭强：《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第24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③ “国家类型”词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④ 张绍欣：《政体、国体与国家类型学发轫》，《学术界》2016年第10期，第51页。

国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的来源将国家分为超凡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西方当前流行的是民主国家、威权国家、极权国家谱系或者民主国家、专制国家谱系；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国家可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国家类型概念虽然重要，但总体上是对国家的政权结构、阶级结构相对静态的、理想化的描述。“目前流行的诸多国家类型学事实上是关于国家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更多的是为了说明国家内政治力量的地位和属性，而不能对国家兴衰和国家治理成败做出有效解释。”^① 相比而言，国家形态更强调国家的具体性、历史性，也更注重全面把握国家结构和本质。

3. 与国体的关系。国体又称为国家的本质、国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国体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② 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但同一国体，因为国情、民族特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不同，政体可能不同，政体反作用于国体。法学学者林来梵认为，作为法政概念，国体经历了从近代德国被移植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再从日本被移植到晚清中国，最后经过毛泽东再定义才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重要概念的过程，国体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装置而曾发挥过建构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从而有力推动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发生相应的演变”。^③ 国体概念的贡献在于突出了国家的社会和阶级结构维度。国家形态包含社会和阶级结构维度，但未将其置于核心地位。

概言之，国家形态是国家的整体构造，包括国家基本制度、社会和阶级结构，还包括立国原理、国家和社会关系、经济形态，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国家的形式和实质的统一、内在构造和外在样态的统一。国家形态的五大要素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整体性才是这个概念区别于其他国家概念的关键所在。

二 秦朝国家形态的基本内涵

名是事物的标识。本文将秦朝国家形态命名为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

① 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② “国体”词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146页。

③ 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5页。

僚制国家，简称君主官僚制国家。提法虽从简，但本文在指称它时都包括了立国原理、国家基本制度、社会与阶级结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济形态五大要素。君主官僚制国家的优势不在于某一具体制度，而在于其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动、支撑、制衡，使得君主官僚制国家成为其自身并发挥效能。

（一）立国原理

立国原理指为官方接受或者官方提出的关于国家存在及其合法性的最基本理论、观点或者主张。之所以将其纳入国家形态，除了其本身就是构筑国家形态的关键要素之一外，它对国家构造和国家运作也有强大塑造力和影响力。比如君主制，不同文化之下的君主制运作模式存在极大差异。秦朝乃天下型国家，其立国原理为天命律法论，其构成包括源于夏商周三代的天命论、法家学说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说。天命律法论在很大程度上使秦朝国家形态区别于一般的君主制国家。

一是天命论。天命论的基本含义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天创造了天子和民众，天将统治权交付天子，由天子来统治民众。天子具有人世间的最高统治权，但不能无视民众的生死，应该维持人间的秩序，照顾好民众的生活，把上天的恩德传达给民众，否则其合法性就会丧失，不再具备统治资格。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认为：“中国政治生活的许多宗教影响，都源于‘天’这一基本概念和附属于天的众神体系，而这个体系能够预先决定包括政治事件在内的宇宙万物的生发过程。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天命’，这种合法性的象征不仅被历朝政权所承认，也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广泛接受。”^① 秦国就有接受天命论的传统。秦武公时期的《秦公罍》铭文称：“秦公曰：我先且受天令，商（赏）宅受或（国）”，还称秦公“应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敷）有四方”。^② 其中的“我先且受天令”就是先祖受天命。秦始皇所用的传国玉玺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史记·秦始皇本纪》108次提到“天”。秦朝留下的碑文中多次出现“天”“天下”，包括“天下咸抚”“初并天下”“亲巡天下”“既平天下”“普天之下”“维秦王兼有

^①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修订版），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②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608页。该书类似铭文很多，恕不一一列出。

天下”“天下和平”等。^①秦朝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论。

二是法家学说成为治国的主要指导思想。无论是君主集权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奉行律法之治、官僚制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居于主干地位、重农抑商、实行思想和制度统一，还是明赏必罚、论功行赏、反对贵族世袭特权、编户齐民等，都体现法家思想。虽然用天命论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但秦朝和秦国统治者，如秦始皇、商鞅，都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家治理上，而非放在对天的祭祀上。除了法家，儒家、阴阳家、道家等流派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秦朝所用。天下国家奉行“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论、血缘论、种族论，这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制奴隶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二）国家基本制度

国家基本制度是在国家组织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制度，是国家形态的最重要内容。秦朝国家基本制度以皇帝制度为中心，以官僚制、郡县制为左膀右臂，以律法之治为基本统治方式、大一统为基础性政治原则，这些要素相互联动、支撑和制衡，构成一个庞大而缜密的国家制度体系。

第一，君主制，即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指与皇帝作为国家的轴心有密切关系的皇帝集权、皇权运作、皇位继承、皇帝起居、皇族特权、皇家礼仪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皇帝制度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最高权力运作、继承以及中央集权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新型政治制度，是国家集权的大发展，标志着中国国家构建的巨大成就，是对西周的间接统治、东周无法统治的制度模式的彻底超越。它在君主官僚制国家中具有统领性地位，其他一切制度和要素都受到它的制约。

第二，官僚制。官僚制在君主官僚制国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织和实现形式，是皇帝制度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一种制衡，联动国家形态其他要素。发达的官僚制成为秦朝的突出特质。秦朝建立了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僚体系，并在全国层面构建了庞大的官僚体系。秦朝官僚体系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原则进行构建的，以律法为运行准则，是一个高效、理性、专业、高度分工的官僚体系。秦朝官僚体系有三大系统，分别为政府（行政）系统、军事系统、监察系统。秦朝设立政府元首统领政府系统并对

^①（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294页。

国家元首即皇帝负责，形成完备的丞相制度。别林斯顿（H. Bielenstein）认为中国公元前2年建立的官僚机构职位总数已到130285个。^①这时距离秦朝灭亡不过5年，汉承秦制，加上秦朝本身官僚统治非常缜密，估计秦朝官僚机构职位总数在13万以上。傅家仪编著的《秦封印泥彙考》一书中列举了434种秦封印，包括左右丞相印、御史之印、中车府印、西陵丞印等各种封印，秦朝官职之多可见一斑。^②《秦律十八种》显示秦对于官吏的管理、考核是具体化精准化的，具有权责法定、赏优罚劣、厚奖重罚等特征，对于从事特定类型的官吏有文化要求，对公文运行有严格规范。^③概言之，秦朝乃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僚国家，官僚体系成为国家运作的骨架体系，缜密精细、权责分明的法律成为官僚体系运行的基本准则，政治忠诚、理性和效率成为官僚体系运行的基本追求。

第三，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原在秦国范围内实行的一套地方政权组织，推广到全国，即建立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秦郡最多时有46个，^④秦县1000个左右。^⑤郡设有郡守，负总责，还设有尉、监等辅助和监督官员，由朝廷任命。郡守有辟除权，可自行配置幕僚属吏。县一级设有令（长），负总责，其他还有县丞、尉，是县令（长）的佐官。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少数几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⑥郡县制不单单是行政区划制度，更是对整个国家组织方式、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塑，是对周朝分封制的彻底扬弃。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确立使得中国成为由中央政府及其代理者地方政府实施直接统治的高度组织化的国家，西方只有在现代国家阶段才取得此项成就。

第四，依据律法进行统治（简称律法之治，区别于法治）。国家统治方式是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内容。与周朝相比，法律取代礼成为秦朝立国治国的基本规

① H. Bielenstein:《汉时期的官僚机构》，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转引自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0页。

② 傅家仪编著：《秦封印泥彙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秦律十八种》，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5页。

④ 林剑鸣：《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3页。

⑤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35页。

⑥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矩,依律法统治成为秦朝国家形态的基本统治方式。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实信徒,对于法家尤其是商鞅、韩非主张的“以法治国”身体力行。《商君书·修权》是秦朝君主集权、以法治国思想的集中概括,强调“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①《韩非子·有度》主张:“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以加,智都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民之轨,莫如法”。^②秦始皇巡视过程中留下的官方石刻中多次流露出依律法治国思想。比如《泰山刻石》提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琊刻石》提出“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驩欣奉教,尽知法式”;《之罘刻石》提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会稽刻石》提到“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后敬奉法,常治无极”。^③

从实践层面看,秦朝法律是在秦国法律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无所不包、十分详细的法律体系。秦律虽比较严厉,但区分具体情况,并不是后世儒家特别是汉儒所说的动辄杀人。睡虎地出土《秦律十八种》,共109条规定,涉及生活方方面面,但无任何条文规定死罪,更不用说夷灭三族之类的酷刑。同时出土的有《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秦律杂抄》有27条规定,无涉及死刑。《法律答问》有191条答问,涉及范围更广泛,包括方方面面,只有4条重罪涉及死刑。从《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来看,秦律只有1.2%的情形涉及个人的死罪,且并无夷灭三族九族之类的罪名^④。

第五,大一统原则。大一统是君主官僚制国家独有的基础性政治原则,包含实现政统和道统融合、政治与日常整合、时间与空间统摄的追求,宽泛而言也属于国家基本制度。“‘大一统’分别包含了‘空间’(天地)和‘时间’(古今)两个维度。帝王不但统领着广大的自然地理疆域,同样也统治着人间社会,通过

① 《商君书·修权》,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页。

② 《韩非子·有度》,高华平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1—50页。

③ (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23—294页。

④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统计。

规定时间起始及其运行准则建构出一套政教秩序。”^①大一统关键在“大”和“一统”，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统一范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政治上的一元主义。主要有：全国乃至于全天下只有一个政治中心，也就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上的一元主义，地方政府不享有制度创设权，必须服从中央政府；全国法制统一，秦律在全国一体化实行；军事的一元主义，暴力资源主要由皇帝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控制。二是思想的统一。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导，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思想统一，力求国民在思想上有高度共识。三是领土的统一，不允许分裂势力存在。四是社会标准和文字的统一。五是身份认同的统一、民众地位的普遍平等。在理想状态下，所有民众都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制度认同，也就是所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

（三）国家和社会关系

国家和社会关系是国家形态的重要内容，反映政权和社会、民众的关系，政权对于社会的渗透力，国家自主程度。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国家形态。国家作为社会的统治者、仲裁者、保卫者，扮演着社会的尺度和法则的角色。国家通过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律法体系、社会规则体系来治理社会，也因此确保了国家政权居于整个社会的中心地位。秦朝在乡、亭设立管理机构，国家控制直达乡里。《汉书》记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②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是南郡郡守发给下级的公文，要求下级政府以秦律为准则强力推进民俗改造，否则予以惩罚，反映了国家对于社会的优势地位。^③秦史专家张金光认为秦朝体制首要特点是“政社合一”“以政府行政系统进行编民、编农甚至于编军”。^④美国社会学者埃德加·凯瑟和华人学者蔡泳指出，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

① 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第83页。

②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2页。

③ 《语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页。

④ 张金光：《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9—40页。

5.2%，欧洲现代早期则更低。^①秦朝是国家权力中心本位、政社合一、强动员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汉朝对其进行了改造，国家与社会关系有所松弛，皇权不下县的设计使得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强国家强制能力和弱国家基础能力形成一种平衡，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

(四) 社会和阶级结构

社会和阶级结构反映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重要属性。秦始皇统一之初中国人口是4000万左右^②，这些人可以分为皇族、官僚、士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少量贱民。皇族、官僚加四民社会的模式已经成型。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在春秋战国几百年混战中几乎消耗殆尽。除了皇族，其他阶层之间可以流动，流动的依据在于功绩和才华，其中功绩包括军功、耕地成绩等。日本秦史专家学者鹤间和幸认为秦始皇生活在“一个不讲家世出身，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奴婢、大臣甚至王后的时代”。^③秦始皇不但生活在这种时代，他统一中国，推动中国由贵族统治彻底转向官僚统治，由身份政治转向非身份政治。哲学学者何怀宏从社会流动视角将秦汉至清朝社会视为选举社会，强调这种社会“体现了一种进入社会上层的单一的最大机会平等的发展”。^④概言之，秦朝在社会和阶级结构方面具有很多现代因素。

(五) 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指国家总体性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是国家形态的重要构成。首先，秦朝继周朝而来，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和周朝一样，是农业经济社会。农业为国民经济之绝对主干、核心产业。美国中国学家陆威仪认为秦汉时期“有90%的人口从事着农业生产”。^⑤秦朝废除井田制，实行国家份地授田

① Edgar Kiser and Yong Cai, “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no. 4, Aug., 2003, pp. 511—539.

②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不同学者估计秦朝人口总数有差异，大致在2000万—4500万。此处从葛剑雄数据。

③ 鹤间和幸：《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杨振红、单印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④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⑤ 陆威仪：《中国早期帝国：秦与汉》，王兴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制，由此构建起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关系。其次，秦朝手工业比较发达，包括铁器、青铜器、陶瓷、漆、纺织等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秦朝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保证冶铁、青铜制造等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性和高效性。再次，秦朝具备较好的城市文明基础和发达的道路网。经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竞争和发展，中国已经形成大量规模较大的城市、地域中心。秦朝大修国家道路，使得整个国家的重要城市、经济中心连接在一起，初步构建起基本的政治经济网络。“秦的皇家道路长达 6800 公里。”^① 君主官僚制国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有相当发展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聚落和道路网基础上的新型国家。

总之，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一种国家权力中心的天下型国家，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和领土，具备强大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它以中央集权、皇帝制度、大一统、郡县制、官僚制、律法统治、世俗主义、强社会动员、高社会流动、集体主义等为重要标志，是一种极为卓越的崭新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如果单看统治权来自于天的主张，可能得出君权神授的结论，但君权神授论从来没有君主功绩德行不足则天命可以转移的思想。单看皇帝制和大一统，可能得出皇帝专制的结论，但要看到丞相及官吏系统对于皇权的实质制衡，以及看到天命律法论对皇权的制衡，皇帝在天命律法论立国原理中不是最终目的，带有工具性。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五大要素相互联动、支撑和制衡，使得任何一个要素不单单是其本身，而且是国家整体构造的一部分。因此，它不能简单地对应现有国家理论中的君主制国家、封建国家、奴隶国家，或者是法治国家、人治国家、掠夺型国家、专制国家等。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本身就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本质。

三 秦朝国家形态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秦朝国家形态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长周期的，包括国家形成、国家形态、国家治理、历史道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等众多方面，最核心的是以下三方面。

^① 陆威仪：《中国早期帝国：秦与汉》，王兴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6—57 页。

(一) 君主官僚制国家是先秦以来中国社会进化和国家形态演进的最重大成果,为后世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长期有效的经典范式,是1912年前中国主流国家形态和中华政治文明核心内容

君主官僚制国家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大约从公元前30世纪出现国家,可称为古国或者古族国。夏商西周出现大型中央王朝国家,有的学者称之为方国或分封制国家,其以天子—诸侯为基本权力结构,以贵族统治、阶级森严等为重要特征。考古学者苏秉琦认为:所有中华民族的各先祖分支都先后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的演变路径,古国距今5000年,此后是方国,大致出现在距今4000年,夏商周都是方国,从秦朝开始是帝国。^①历史学者李学勤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和国家起源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为早期文明形成和国家确立期,“在中国为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的夏王朝之前的方国崛起时期”。^②历史学者田昌五认为:中国古代国家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产生,其后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从黄帝到夏代为第一阶段,又可分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早期城市国家时期)、城市国家联盟时期两个时期。商、周属于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出现了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物。^③

西周结束后,中国向君主集权的领土国家演变。到了战国后期,中央集权、官僚制、郡县制等重要制度已经初步成型。秦朝是集大成者,秦始皇结合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文化,在战国各国制度基础上,逐步构建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10年,他一直在对君主官僚制国家进行建构、调适和完善,君主官僚制国家的主要框架和基本制度在他执政期间已经形成。此后,汉朝对秦朝“实验性的”帝国政府进行了改造并最终定型,“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④因此,君主官僚制国家是中国先秦以来国家形态演进的产物,发轫于古国时期,淬炼于春秋战国,主体架构和基本内涵完成于秦朝,汉初将其改造并定型。^⑤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80页。

②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③ 田昌五:《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第74—76页。

④ 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⑤ 社会学者赵鼎新对此过程和结果有深入独到分析,提出儒法国家概念。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Dingxin Zhao,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君主官僚制国家超越了秦朝的短暂存在，在中国延续 2133 年，为历朝所继承和使用，直到清朝灭亡。因此，它是 1912 年前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形态。法国汉学家勒内·格鲁塞认为，秦始皇创立一套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竟持续了 2100 年之久，这项成就足以跟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相媲美，但比它们更持久。^①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秦汉帝国这一最早统一国家的出现”，在中国史上的意义“在于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与这一时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②

（二）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从根本上塑造和影响了中华政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和发展走向，其出现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秦朝处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也处于中华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旧的国家形态、国家制度已经失去吸引力，被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抛弃，国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战乱不已。中国没有退回到周朝国家形态中去，也没有继续陷入混乱和分裂，而是通过战争淬炼和政治家的精心设计，创造了新国家形态——君主官僚制国家。

君主官僚制国家回答了时代最重要的课题：制止战乱，创造和平，带来安全和秩序，因而为时代所接受。正因为当时处于中华文明、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转折点和关键性的生长期，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文明的内涵、特质和发展走向。福山指出：“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不但活过了汉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③ 英国学者塞缪尔·E·芬纳认为，秦始皇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决定性的，中国所有后来的帝国都采纳了这种基本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王朝。^④

君主官僚制国家包括上述提到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世俗主义、郡

① 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兴盛与辉煌》，秦传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8 页。

② 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顾姗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③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0 页。

④ 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02—503 页。

县制、大一统、律法之治、阶级开放、高社会流动等特征。这些特征都对中华文明有深刻影响。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中华文明的国家中心主义属性和世俗主义倾向，留给中国一个极为突出的中央集权、强国家、单一制、阶级开放和世俗主义传统，使得中华文明成为政治功能发达的世俗文明。

概言之，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出现，不是中华文明的倒退、畸变、灾难，恰恰相反，而是中华文明的革命性飞跃，使得中华文明迈向成熟，从此它就是一个强大的自洽的文明，具备应对挑战的强大能力，也具备向外输出制度、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坚实基础。君主官僚制国家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华文明的特质，它的缺点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华文明的缺点。此后，中华文明都是在君主官僚制国家和秦朝文明的基础上修正、发展或再造。

（三）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决定性地增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使中国成为古代东亚世界的领导者，为中华文明圈的形成打下根本基础

在人类文明史上，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族群的关系一直被视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关系，深刻影响国家制度形成和演变、历史和文明进程。美国历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地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关系史。”^① 华夏族的主体经济形态为农业，牧业为辅。从夏商到西周乃至于战国时期，华夏族在文化上、制度上、生活方式上处于相对发达和先进的地位。当时使用的分封制国家形态初步地保持了华夏族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巩固。到了西周，华夏族政权受到以游牧为主业的外部族群的重大挑战。分封制国家形态带来国家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分散化，不利于华夏族集中力量对抗外部族群的沉重压力。在一系列举措失当的情况下，军事力量分散化、碎片化的西周灭亡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外部族群戎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外部族群对于华夏族、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区域的威胁已经到了极严重的地步。北方的诸侯国都受到了这种挑战，他们修筑长城、保持强大的边防军以防备和抗击外部族群的进攻。匈奴崛起后，以其骑射习惯和全民皆兵的传统，构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快速的进攻能力。冒顿单于“罚右贤王，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历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①匈奴一再侵入中国北方，杀戮和掠夺人口，成为中原族群的巨大挑战。

此时的中国必须从全国层面调整完善人员分布、物资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进行全国动员，解决国家分裂问题，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也就是说，国家必须重组，国家形态必须调整完善。从周朝的分封制国家到秦朝的君主官僚制国家，这种变革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对整个国家的革命性重组。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动员体制，它的出现使得中国人掌握了可以对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和动员，同时又能进行高效理性治理的制度模式和统治方式，使华夏族的实力和能力实现了革命性飞跃，从此华夏族在与外部族群、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较量中长期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中国自秦汉，大体上版图确定，民族抟成，中国史遂开始有其对外问题。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②

秦始皇时代，国家以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保障力，组织调动十万大军长期守备北方，修筑万里长城，对抗匈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取得巨大成功。史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峻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③此后，汉武帝组织开展了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次大规模战略反击，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匈奴远遁或归顺，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是这种国家行为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和基本保障。

中国走入君主官僚制国家时代，华夏族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和军事优势才得以真正确立和巩固，华夏族建立的国家 and 文明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吸引力的存在。一旦这种优势地位确立了，华夏族、华夏文明和周边族群、周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就能够以我为主地顺畅进行，中国才得以成为东亚的领导

①（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匈奴列传》，第2896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2页。

③（汉）司马迁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匈奴列传》，第2886页。

者和核心国家,成为东亚文明的主要源头、主要代表,并和印度一道,成为东方世界的主要代表。

四 秦朝国家形态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种国家形态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包括它在世界国家形态史上的地位,它对于人类政治走向、世界政治演进的影响,对于世界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人类现代国家形成的影响和贡献等。

(一) 秦朝国家形态是当时世界并曾长期是世界史上最先进的国家形态,是世界政治史和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国家形态和社会治理范式供给

秦朝国家形态展示了中国人在政治上的卓越智慧,也展现了中国国家、东方国家、亚洲国家的独特个性和禀赋,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政治史和世界国家史。希腊城邦、亚述帝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欧洲封建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古代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犹太神圣君主制国家、西方民族国家等,都是世界史上重要的国家形态。中国贡献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形态:大一统世俗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以君主制、中央集权、世俗化、功绩主义、高社会流动、郡县制、官僚制、大一统、常备军、平民社会、集体主义、极少的奴隶阶层、有效的秩序等要素为特征,在世界国家形态史上独树一帜,是一种强大的主流国家形态。它拥有的上述国家要素,同时期其他国家和文明大多只拥有个别内容。

这一点学界有共识。翦伯赞认为“当秦王朝在亚洲东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时候,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是生活在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只有极少数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① 政治制度史学者孟祥才认为,秦汉帝国是“世界古代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秦汉皇朝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其规模的宏大,组织的严密,各种职能机构的协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制约机制,都较同时代的贵霜帝国、罗马帝国和安息王国“完善和成熟得多”。^② 日本历史学

① 翦伯赞:《秦汉史十五讲》,张传玺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0页。

② 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8页。

者坂本太郎在研究日本统一国家的建立时谈到中国，认为“当时中国在东方，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①

在秦朝出现前，中国经历了西周分封制国家形态的没落、民族进一步融合和思想史上的轴心期，为更高级别国家形态的生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制度、物质和族群基础。秦朝汲取先秦政治文明的精华，创生极具中国个性、东亚个性、亚洲个性的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以中国智慧丰富了世界国家形态史。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具有强烈的中国属性、地域属性、文明属性、民族属性，同时具有强烈的东亚性、亚洲性、世界性。其具备的许多要素，代表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比如高社会流动性、阶级开放、官僚制、功绩主义、世俗化、强调民族融合而非民族对立、理性主义，等等。相对于欧洲，这些重要要素的更早出现，显示了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的独特性、独立性和成熟性，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东亚在探索人类普世性政治秩序问题上的领先性。

（二）秦朝国家形态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国家构建大破晓

现代国家是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类通往更高级阶段的必经之路。现代国家构建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长期挑战。现代国家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理论。对于政治学而言，几乎所有国家理论都涉及或者需要回应现代国家问题。既然如此，极有必要从现代国家视角思考秦朝国家形态问题。

笔者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国家，而且每种文明的现代国家内涵不尽相同。以西方历史分期作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分期，是亟待破除的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国学家孔飞力就曾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②

虽然现代国家的具体形态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点。人类通往现代国家必须翻越五座“珠穆朗玛峰”。第一座珠穆朗玛峰是国家机器现代化。包括建立中央集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武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②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2页。

权的官僚制的国家机器，实现公共权力国家化，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官僚制；构建强大的国家强制性能力和基础性能力。第二座珠穆朗玛峰是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即实现社会和阶级结构平等化、社会流动普遍性，打破阶级的专横和固化，确保绝大多数国民不会因为出身的原因而缺乏上升的机会。第三座珠穆朗玛峰是国家和人民关系现代化。包括国家施政以人民为导向，建立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制政府，不可任意侵犯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民中的优秀者可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人民以国家为最高的忠诚对象，形成以国家为中心认同的国族。第四座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统治方式现代化。即国家统治方式的理性化、世俗化、法治化。非神权统治、理性主义和严肃的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必备要素，必须克服人治的任意性和非制度化特性。第五座珠穆朗玛峰是经济形态现代化。指的是国家经济维度的发达。从高标准的意义上来讲，工业经济形态或者更先进的经济形态才能说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形态。这五座珠穆朗玛峰是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的巨大挑战，每一座珠峰的翻越都会付出惨重代价，也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和生产力，推动国家飞跃式发展。

借着周秦革命的能量，秦朝成功地翻越了第一座、第二座珠穆朗玛峰。但在国家与人民关系、国家统治方式、经济形态现代化三座珠穆朗玛峰前，它只进行了一部分，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这就严重制约了秦朝发展，并在特定条件下促成秦朝二世而亡，也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秦朝国家形态是拥有很多现代国家特征的传统国家。“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与欧洲进行区分的话，那么首先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很久以前就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包括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早于欧洲各国完成了国家转型。”^① 尽管如此，秦朝实现了人类现代国家构建的大破晓和大奠基，对人类现代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人类现代国家构建莫不受到其深刻影响。

（三）秦朝国家形态在世俗化、直接统治、常备军制度、文武关系、国家形态延续性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或者世界前列

第一，秦朝拥有当时世界最彻底的世俗型政治文明，为古代世界树立了政治世俗化的中国标杆、东方标杆，展示中国政治进化在 2200 多年前已经取得惊人

^①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1 页。

成就。这种成就使中国较早从神权的沉重束缚下初步地解放出来。

高度的世俗性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主要文明中独树一帜。在公元前3世纪，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笼罩在神权的阴影下时，中国出现了高度世俗化的政治文明，实属罕见。秦朝立国原理为天命律法论，天命固然极其重要，但高度理性的法家为秦朝注入冷酷的理性主义，人世间的事务才是统治者的主要职责。美国中国学家史华慈指出：秦始皇“十分信赖法家的‘乌托邦’梦想，这一乌托邦是由非人格化的法律机制、‘技术’和神秘的权势支配的；在这种社会中，数不清的私人激情、情感、价值以及信念的力量都将被清除出去”。^① 相比苏美尔、埃及、犹太王国、罗马等，只有中国最彻底地践行世俗主义政治原则。

第二，秦朝是世界历史上极为深入的直接统治模式，显示中国国家统治力较早就达到极高程度。

人类早期政治形态很多都是间接统治模式。从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是人类政治的飞跃。夏商西周就是间接统治模式，国家权力没有直接渗透到基层社会。到了秦朝，变成非常彻底的直接统治。在秦朝的权力结构中，皇帝居于中心地位，其下是高级官僚，再下是低级官僚，没有分封制，也没有地方诸侯，实行郡县制，以地域为统治依据，县之下还有乡、里、亭，乡里是一级政府，亭为派出治安机构。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国家掌握全国人口数量，依据户籍进行管理，“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② 国家实行份地授田制，授田民众需要承担税赋和徭役，国家权力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地方和基层、延伸到每一个家庭。这种先进、发达的统治术，是古希腊不敢想象的，也是中亚游牧民族建立的粗放帝国、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国家所不敢想象的。

在政治智慧较发达的古罗马，统治也没有深入到这种程度。“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更没有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中央委派的财务官也只在行省而不下基层，更懒得设垂直管理的基

^① 本杰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

^② 《商君书·境内》，第140页。

层税吏，征税就摊派给地方领袖”。^① 罗马帝国虽然处于罗马历史后期，但仍旧是间接统治模式。

第三，秦朝拥有世界古代史上极为完善的常备军制度，这预示着人类军事制度发展的正确方向，预示着中国拥有对抗外敌的强大武器。

中国至少从商周就开始实行常备军制，到了秦朝，军事制度进一步完善。芬纳认为中国最早出现了受过专门训练、领薪酬、按照理性原则组织的常备军。^② 秦朝常备军制有以下特点。第一，国家常年拥有大约 130 多万或者 140 多万军队^③。秦朝军队包括“皇帝警卫部队、首都卫戍部队、边防戍守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种”，前两者被称为中央军，后两者被称为地方军。地方军由郡县统领，比较分散，它们是中央军的来源。秦朝军队分为陆军和水军，陆军包括步兵、车兵和骑兵，全军的武器装备由国家提供。^④ 第二，军事系统独成系统，形成完备的军事管理制度。军事领域实行一元化、专业化的领导体制，皇帝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代表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太尉、国尉、都尉、关都尉、郡尉、县尉、将军等武官都接受皇帝领导。地方军事长官负责训练和管理军队，但无调兵权、统兵权。凡 50 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有皇帝的命令，实行符节制度。第三，实行耕战结合、寓兵于农、军功爵制、兵役和徭役结合，军事体系、经济体系、官僚体系相互打通、相互支撑。秦朝全国男子 17 岁至 60 岁都有义务服役，政府以郡县为单位进行组织。政府通过份地授田制、耕战体制、郡县制、官僚制将整个国家都组织了起来。士兵在战争中获得一定的军功，将在田地、爵位和官职方面获得制度化的相应回报。

这些制度保障了职业化的秦朝军队具备强大战斗力。游牧民族全民皆兵，一般谈不上什么常备军。古罗马也有常备军，罗马军团的战斗力是惊人的，但时常干预政治。中世纪欧洲实行雇佣军制，基本没有国家常备军。发达的常备军制度，显示秦朝国家形态摆脱了全民皆兵、社会分工落后的低级阶段。

第四，秦朝是古代世界史上较早的以文御武模式的成功案例，预示着人类国

① 潘岳：《秦汉与罗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第 20 页。

②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2 页。

③ 霍印章：《中国军事制度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2—65 页。

④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1—83 页。

家文武关系的正确方向。

文武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关系，是衡量国家形态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实行以文御武是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也是国家长期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当代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依旧受到无序的文武关系的困扰，军人干政、军人政变时有发生。

首先，秦朝尚武，但却是一个文官制国家，军事系统从政府系统剥离，独成体系，由皇帝领导。皇帝之下设有专职最高武官太尉，军事系统的地位低于政府系统，不得干预政府系统事务。整个国家的暴力资源都由皇帝、中央政府以及受到其有效领导的地方政府领导，处于文官领导下。武官没有机会和渠道夺取政权。秦朝丞相是文官，管理国家是主要职责。在地方，军事官员地位低于地方行政首长并受其节制。在郡一级，有郡守、郡尉、监御史等。郡守是地方总负责人，郡尉是地方军事官员，受到郡守节制。

相当多的文明都没有解决好文武关系问题。比如，在罗马帝国，军人干政是巨大的政治问题。潘岳指出：“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军队代行着许多政权职能。行省总督要仰仗军队的威势来维持治安与收税，收上来的税又变成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代表地方的军阀”“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① 西方直在近现代才解决好文武关系问题。

其次，暴力资源是国家化、一元化的。在秦朝，任何部族、社会势力、贵族和高官都不世袭性占有暴力资源，任何合法的暴力资源都是国家暴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受到国家直接领导，即暴力资源完全是国家化的。这与军事权力二元化、私人化、世袭化的周朝截然不同。

第五，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国家形态，创造了世界政治史和国家形态史的奇迹。

秦朝国家形态延续 2133 年，在世界统治史上是罕见的。古国、城邦、周朝分封制国家、亚述帝国、波斯帝国、民族国家、西式自由民主政体等，从延续性来看，都还没有超过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芬纳统计了不同“政体”的寿命，其中罗马从建城到灭亡，总寿命为 1229 年；亚述帝国 744 年；拜占庭帝国 874 年；威

^① 潘岳：《秦汉与罗马》，第 21—22 页。

尼斯共和国 1112 年；哈里发帝国 312 年；奥斯曼帝国 568 年；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 220 年，萨珊波斯帝国 427 年；中国君主政体 2133 年；古埃及 2820 年。^① 古埃及时间虽长，但不是同一国家形态的延续。君主官僚制国家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强大帝国都消亡时，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绝，即使是其他民族或者族群夺取了中原政权，也不得不采取这种先进而强大的国家形态。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赖肖尔认为，秦始皇“所建立的帝国制度虽偶有间断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②

（四）秦朝国家形态具有超强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在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上有独特经验，具备构建同质化民族的强大能力，是十七八世纪前的世界史中解决国家整合和民族整合问题的最成功案例

第一，君主官僚制国家高度注重国家整合和民族整合，是多元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杰出代表。促进族群整合、民族整合的因素包括血缘、利益、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但无论怎样，都离不开思想和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具有强大整合力，对于奉行这些宗教的国家的人们而言，一出生就接受了一整套宗教理念，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强大凝聚力。

中华文明是世俗型文明，没有宗教，如何保证凝聚力、整合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处理不好国家和民族会四分五裂。君主官僚制国家从多方面入手解决此问题，其中有两方面最重要。一是实行大一统。除了政治和军事统一，还实行社会标准统一、文字统一，特别是思想统一，即以一种思想为主导性意识形态，在全国推开，同时包容其他思想。通过思想统一，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人口同质化，构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避免民族的冲突和分裂。秦汉两朝的文化政策，无论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这个目的。二是拒绝身份政治，强调民众的平等性。在族群和民族政策方面，秦朝境内存在不同地域的民众，但在进行统治时，不区分原秦国人民和

^①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2—33 页。

^② 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4 页。

原六国人民，主体部分都实行郡县制，民众都称为黔首。黔首之间不因地域而出现地位差异，秦朝法律没有规定原秦国人民就享有特权。少数民族地区则设“道”，尊重族群差异。少数民族接受了秦朝文化，也可以融入华夏族。福山说：“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①

第二，其他古代国家大多强调族群分立而非族群融合，也极少进行同一化的民族构建，即使强调民族融合，也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希腊、罗马实行奴隶制度，民族、种族、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森严的，不能轻易进行民族融合，这大约也是他们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斯巴达打败美塞尼亚人，整个地掠夺为奴隶，称为黑劳士。斯巴达的行为在古代西方世界具有普遍性，即征服别的国家或者族群，将其整个地变为奴隶，自己不生产，寄生在奴隶阶级之上。

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口分三类，地位不同，形成三大对立的种族化人口集团。根据吉本的研究，罗马公民作为征服者，拥有统治权和各种特权，处于少数地位；行省属民次之，人口大约为罗马公民的一倍；最下等是奴隶，即被征服者，其本人和子孙世代代为奴，毫无人权，人数大约占全国人口一半。奴隶即使被主人赦免为自由人，三四代之后，奴隶的出身仍旧不能洗刷干净。^② 罗马帝国体制决定了这三种人的法律、政治身份截然不同，决不可混淆，更不能奢谈民族融合。历史学者易宁指出：“在罗马境内，始终没有发生如秦汉那样的民族融合情况”“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不像秦汉帝国那样将其与内地融为一体，而是将其作为奴役剥削的对象。向罗马交纳赋税成为行省城市最重要的任务”。^③ 除了这种阶级政策外，罗马极少进行有效的全民性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构建。“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 300 年后，农

①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8—89 页。

②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第 33—35 页。

③ 易宁：《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求是学刊》2006 年第 6 期，第 118—119 页。

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①。也正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全民性国家认同构建，“罗马帝国领土上的人民，纵然在法律上具备罗马市民的身份，但文化上却没有实现罗马化，以至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国民的自觉意识，这就是分裂因素无时不在的原因”。^②

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情况与罗马帝国相似，都是军事征服和扩张，较少进行有效的民族构建。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帝国比罗马帝国要略胜一筹，通过宗教进行民族构建，伊斯兰化就是其重要手段。但奥斯曼帝国在近代转型中仍旧分裂，而只有中国保持了国家领土的总体完整。因此，它们的民族构建、国家构建也不如中国。洪春嵘提出，秦朝大一统政策带来的华夏族向心力、凝聚力是“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古罗马帝国等上古帝国所不能比拟的——这些帝国是依靠武力兼并形成的，内部的离心力足够强，一旦土崩瓦解，就再也无法恢复从前的疆域了”。^③ 在全世界帝国、王国中，“古代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帝国，尽管规模很大，但由于人口同质化程度很高，所以它得以幸存”。^④

概言之，古希腊、古罗马、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无法像中国这样有效实现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同步推进，一旦分裂和失败，就再也没有统一起来。中国在这方面是这些国家中做得最好的。

（五）秦朝拥有当时世界最彻底的平民社会，开创了中国式和东方式社会自由传统，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人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探索国家的整体性阶级阶层关系的最重大成果

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打破阶级固化现象，出现反阶级化、反以血缘为中心的等级化的现象。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论功行赏、靠能力获取社会资源成为国家制度。在秦朝，从社会底层上升为社会上层的道路是完全畅通的，平民子弟担任政府高官是普遍现象。李斯原本不过是一个楚国小吏，因才华而进入秦始皇统治集团的核心圈，成为秦朝丞相。这是中国社

① 潘岳：《秦汉与罗马》，第20—21页。

②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③ 洪春嵘：《秦的统一是文字、疆域和华夏族三个层面的统一》，见王子今主编：《秦统一的进程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297页。

④ 阿尔伯特·阿莱西纳、恩里科·斯波劳雷：《国家的规模》，戴家武、欧阳晓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页。

会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国家形态演进在社会形态层面的反映。中国是古代世界官僚制最彻底的地方，官僚制对中国社会的平民化、非阶级化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这种社会相对于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差别何止于天壤？政治学者徐勇提出东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命题，指出：“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农户小农的制度。与农奴相比，中国的农民属于自由小农”，其特点包括“人身自由”“经济自主”“社会自治”“思想自在”“政治自力”。^①当然，秦始皇频频发动战争、大兴土木，侵占了农民的自由和权益，这是不可取的，但这不成为否定这种制度包含社会流动、社会自由的理由。

古希腊、罗马号称自由世界，但却是一个残酷的、低级的奴隶社会。前文述及，罗马是奴隶制国家，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为奴隶。这类国家是严重撕裂和对立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压迫结构，自由只属于少数公民。波斯、古埃及、马其顿也没有秦朝这么彻底的平民社会。汉朝的平民化不如秦朝，因为其册封了大量功臣和王室子弟，人为构建了贵族阶级。中世纪的西欧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没有社会流动，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才打破这种社会结构。

（六）秦朝国家形态较好地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问题，为人类解决超大规模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实践和理论

从早期国家到王国再到帝国或者超大规模国家，是国家演进的天然趋势，带有规律性。在当代，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国家都是领土规模巨大的国家，比如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治理特别是大国、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问题，是政治学永恒的重要课题。古希腊城邦的经验，亚述、马其顿、罗马等帝国的经验，西方民族国家的经验，都是人类宝贵的政治经验，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智慧，但不能相互取代。被西方人神化的古希腊罗马充满局限，根本无法解决大型国家治理问题。

古希腊政治的根本局限在于以碎片化、奴隶制、阶级压迫为天经地义。英国历史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说得很清楚：“希腊城邦和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任何人类社会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是希腊城邦的持续不断的和无法挽回的割据状

^① 徐勇：《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2—98页。

态”“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在它全盛的时期，也不过拥有大约三十几万的人口。其他的希腊城市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这个数目里一半或过半是奴隶和异邦人”。^①他还指出：希腊人的思想里难以逃越的关卡是在心理上把小型城邦作为国家的最终形式的成见，钳制希腊人思想的第二件事是家奴制度，没有它，人们就会觉得既不舒适又不尊严。^②美国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希腊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对手存在，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强烈的政治关系把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排除在外了，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③正如芬纳指出的，希腊“城邦政体是个死胡同，它不能扩张，只能自我复制。它也无法自卫，因此注定要被吞并”。^④希腊拥有的是短暂的、建立在奴隶阶级痛苦基础之上的痛快和自由，最终陷入马其顿帝国的铁蹄下，得到的是长期的不自由和被统治。古希腊城邦政治存在与人类国家演进和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的根本局限。

罗马的根本局限在于以军事征服和奴役他族为荣，本身就是奴隶制国家，无法有效推进民族融合；统治机器极为粗糙，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官僚机器。一是无法进行民族融合。前文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奴隶数量占据该国人口一半左右，罗马公民是寄生于奴隶阶级的寄生虫。这种社会结构导致民族无法融合。民族构建是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罗马的国家构建难以在民族构建维度推进。二是统治机器粗糙。罗马是粗糙的征服式统治，没有像样的官僚机器，其官僚机构和秦朝相比非常粗陋。这一点后文将详述。总之，罗马在人类政治史上虽然有共和制和法治的贡献，但始终无法解决民族融合、国家机器现代化、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问题，这是它的根本局限。而这些问题，对于超大规模国家具有至关重要性。因此，罗马也未解决好超大型国家的治理问题。

中国则不同。中国国家由小变大，从古国或者说古族国到分封制国家再到君主官僚制国家，构建并发展了超大规模国家，把大量的人口、族群统一在一个国

①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吴文藻、冰心、费孝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

② 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上），第297—298页。

③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简史》，施诚、赵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1—92页。

④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家里。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非常好地解决了超大规模国家的国家构建和治理问题。天下主义、中央集权制、君主制、官僚制、郡县制、普遍性的社会流动、大一统、军功爵制、普遍性的社会平等、阶级开放等，构成了秦朝国家形态的重要要素，有效保证了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推进。中国从秦汉到唐元明清，规模领土都是超大的，且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清朝兴盛时期，统治领土超过1300多万平方公里。这就是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巨大统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

秦朝是探索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直接统治模式的先行者。秦朝的许多制度，都是现代国家采用的制度，蕴含了极多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政治史，为不同地区的人们构建国家、治理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直到19世纪初期，秦朝国家形态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形态。

（七）秦朝国家形态的产生和传播对世界史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是世界史的巨大进步，是世界中国化的起点

所谓世界中国化指中国文明和中国元素对于世界的影响、塑造和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受到世界影响。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并非文化帝国主义。^①今天的世界是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无论是国际话语权，还是科技创新，西方都占据重要位置。18世纪以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西方化的世界，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都打上西方文明的烙印。以政治制度为例，很多人不自觉地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秦朝的统一以及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的出现，是世界特别是东亚和亚洲中国化进程的真正起点。费正清表示：“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的来源。”^②秦朝国家形态诞生后，中国因为有了国家形态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巨大优势，在物质力量、技术力量、文化力量、制度力量和

^① 美国学者彼德·J·卡赞斯坦从中性立场使用了中国化概念，认为“中国化与欧洲化、美国化、日本化、印度化和伊斯兰化进程类似……中国化文明进程不仅通过从中国向外扩散，对其他文明进程产生影响，而且中国化文明进程将中国暴露在与其它文明更为密切的关系中，所以其他进程也在重塑中国中发挥作用。”见彼德·J·卡赞斯坦主编：《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魏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页。

^② 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军事力量上长期具备巨大优势,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力量,成为古代世界主要的政治中心、权力中心、文化中心、技术中心、制度供给中心和创造中心。中国从此在世界史上成为一个具有永恒含义、不可忽视的词汇,世界历史从此有了中国的强烈痕迹,世界受到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力量的强大形塑。美国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将秦汉王朝、明朝称为“东方核心”,将历史上的中国视为东方文明的核心。^①这反映他对古代中国地位的认可,也是符合事实的。

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传播到了东亚很多国家,深刻改变了东亚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格局。中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欧洲也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孟祥才指出:“秦汉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文明中心,对周围世界,特别是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绵长的丝绸之路使中国的文化广泛地辐射中亚,并越过地中海的浩渺波涛到达古罗马的王廷”,随着秦汉皇朝行政管辖权沿着南中国海的不断向南推进,红河和湄公河下游的原始民族完成了从原始社会而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的飞跃,朝鲜和越南基本上都在秦汉两朝的行政管辖范围,因而其政治体制也基本上仿照中国。^②历史学者杨东晨指出:秦朝“和印度、罗马犹如在同一时期先后升起的三盏耀眼明灯,照耀着世界,推动着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发展,而秦朝的文化从总体上看,无疑是当时的最为灿烂的进步文化”。^③

因为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的建构,中国比西方早了1800多年进入了一种国家机器高度发达、社会阶级阶层高度开放、思想文化高度世俗化的时代,这是一种“古老的现代性”,是巨大的文明成就。由于东亚都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圈的内层,这就使得东亚在政治和社会上,在相当长期的时间里保持了对于欧洲、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先进性。当这些地方笼罩在神权或者是前国家状态的阴影下时,东亚已经有了“古老的现代性”。这种古代的现代性产生了巨大示范效应。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它深入而全面地影响当时和后来两千年的世界,世界历史出现了长期的中国化进程。

世界中国化起点是秦朝,后继的汉朝以及历朝历代,特别是统一的强盛朝

① 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381页。

② 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第428—429页。

③ 杨东晨:《秦文化与当时世界诸国文化的对比研究》,《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28页。

代，如唐宋元明清，都采用了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这大大推动了世界中国化。当然，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世界中国化开始萎缩、逆转，世界历史开始西方化进程。西方化持续两百年后，随着中国不断壮大，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势力不断上升，“西强东弱”局面得到改变，“东升西降”现象为我们感知到，中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世界历史西方化进程受阻，又出现了世界中国化、东方化现象。如果将发端于秦朝的世界中国化进程视为第一期，那么发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中国化进程则可以视为第二期。

在世界中国化第一期中，主体背景是农业时代，中国的制度、技术、文化、生活方式处于领先状态，特别是相对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周边国家和民族觉醒比较晚，对于主体性的强调相对较弱。因此，以这些国家自主学习中国为主要方式，中国国家形态、政治文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先进技术整体性向外传播，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华文明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相对于欧洲，中国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流的不畅，中国的影响力是逐渐、缓慢发挥的。在世界中国化第一期中，中国作为伟大的文明中心和主要技术创新中心，给世界带来的是文明、善意和进步。这和近代以来的西方化是截然不同的。欧洲人通过工业革命、宗教革命发展起来，对外展开了残酷的殖民和掠夺，给世界人民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血和泪。

在世界中国化第二期中，主体背景是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整体国际环境是西强东弱，中国在不断崛起，中国和东方整体上稍弱于西方。但中国国家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又是拥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快于西方国家，中国制度和模式的吸引力在逐步增强。当前，通过自力更生和学习西方，中国的绝对实力已经远远强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将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人的自信和创造力在不断增强。今天的世界，科技和经济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规模越大、越先进的国家越能开发和利用先进科技、发展经济，这为世界中国化赋予新特征。中国在科技、经济、文化和国家发展模式选择等方面都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引导力和塑造力。另外，当前主权国家普遍确立，各民族普遍觉醒，各国都强调主体性，像第一期那种周边国家整体性学习和移植中国制度和中华文明的年代已不存在了。和第一期

一样，这次中国化带来的同样是善意、进步和多样性，是人类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

(八) 秦朝是世界第一波官僚化浪潮的组成部分，也是其最高峰，同时是东亚世界官僚化浪潮的示范者和推动者，是16世纪以来西方构建官僚制的重要参考，对西方官僚制乃至现代国家的出现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一，官僚制含义和重要意义。官僚制必须有严格定义，否则就没有意义。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具有六个特征，包括官职权限法定，官吏之间的等级化隶属关系，书面文件和文员作为官吏体系运作基础，对官员的专业化训练，官员全身心投入公务，官员的专业化。^① 芬纳认为：“现代官僚机构往往会有以下几个特征：等级分化；长期起作用；不同领域的专业化；教育和职业上的资格；全职并领薪酬；受规则的约束。”^② 笔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演进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不同阶段出现官僚因素。职业化专门化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是官僚化的因子。当然，官僚因素、官僚机构并不等于官僚制，只有官僚机构等级化而且形成比较复杂的体系，官僚的产生选拔和任用依靠能力和功绩而非血缘，官僚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僚体系是对全社会开放的，官僚体系的运行主要依靠理性和法律或者法律性质的规则时，才符合官僚制的基本条件。出现官僚化、官僚因素是形成官僚制的重要基础。

官僚制是人类组织和管理国家的先进手段，是人类走向更高的社会阶段的基础性制度。韦伯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机器的主体性内容，将现代国家和官僚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奠定官僚制理论、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他说：“大规模的现代国家绝对要依赖于一种官僚制基础。国家越大，而且越是要成为一个强国，就越是要无条件依赖这个基础。”^③

第二，世界史上第一波官僚化浪潮大致从公元前40世纪苏美尔城邦开始，这是一股在不同文明先后出现的浪潮。在中国，夏商西周都有官僚化因子，尤其是西周，形成了初步的官僚体系。李峰认为西周中期时政府发展成了一个官僚化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5—1097页。

②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③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第1110页。

机体，在春秋战国期间，地方封国逐渐向大的“领土国家”发展，并在扩张中发生了第二次官僚化，为秦帝国建立创造了条件。^①到了秦朝，官僚制成熟。东亚世界的官僚化则受到秦朝官僚制的塑造。古代比较优秀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官僚因素，东方国家在官僚化上要比希腊、罗马等西方国家程度要高。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形式是苏美尔城邦。苏美尔城邦实行神圣君主制，“另一个并行不悖的特征是大量官僚机构的存在。正如所有体系都必须如此一样，国家拥有永久性的管理机器，在文件、宗卷、档案及其往复基础之上运作。官僚机构的上层包括宫殿和神庙中的抄写员、会计。由于书写技艺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学会，因此，与那些门房、搬运工、苦力相比，这些人只是少数”。^②埃及是官僚化程度比较高的古代国家，但官僚是世袭的。埃及古王国“由中央官僚机构来治理，除了各种名号之外，我们对其知之甚少。而且，它们往往只是一些没有职责权限的头衔”“这一体系的高级职位高度依赖世袭。虽然部门是专业的，但部长们却不是”。^③波斯是古代国家中世俗化和官僚化程度都比较高的。“波斯帝国没有祭司阶层，朝廷由许多高度组织化的官僚机构组成，地方的自我管理能力高度发达。有一点是其他帝国所没有的，那就是各地十分发达的世袭贵族。朝廷正是通过这些贵族进行统治的，而不是通过官僚机构或者祭司阶层。”^④波斯存在大量世袭贵族，官僚化不彻底。

在这波官僚化浪潮中，希腊罗马官僚化程度比较低。希腊重在民主制度，强调直接参与，人口规模极小，根本就没有官僚制发展的太多空间。根据摩根·汉森的研究，雅典作为希腊最大的城邦，公元前4世纪行政官员大约有700人。^⑤这个数量是很少的。芬纳指出：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政治过程是世袭的服务贵族和人民大众之间的辩证互动，没有职业化的祭司阶层，没有职业化的官僚

①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0页。

③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④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4—335页。

⑤ 摩根·汉索：《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页，转引自李渊：《先秦政治与古希腊城邦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4页。

集团,也没有职业化的军队”;罗马帝国和汉朝的一个不同“在于罗马几乎没有领受俸禄的专职官僚”,和汉朝官吏比起来,罗马官僚数量微乎其微。^① 弗朗西斯·福山说:“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② 概言之,希腊罗马有官僚化因素,但无官僚制。罗马衰亡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进入封建国家状态,其政治制度很像中国西周,更谈不上什么官僚制。概言之,在古代世界,国家建立后普遍出现官僚化因素,但大多没有形成官僚制,直到秦朝出现。

第三,秦朝官僚制是这波官僚化的最高峰,秦朝官僚制和秦朝国家形态对欧洲产生直接影响,并成为世界第二波官僚化浪潮的原型。秦朝官僚制无论在非人格化的机构设置、官僚数量、官僚选拔任用、官职数量、官僚运行的法律依据、官僚的世俗化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③ 美籍华裔国际关系学者许田波认为,论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和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直接统治的能力,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④ 谢和耐指出:“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⑤

官僚制是国家机器现代化的产物,必然释放巨大生产力和能量,其一旦产生就必然向世界传播。韦伯指出:“官僚制一旦完全得到确立,就会成为最难以摧毁的社会结构。官僚制是把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因此,作为理性组织权威关系的工具,官僚制曾经是,而且至今仍是官僚机器控制者头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彻底实现了官僚化行政的地方,随之产生的支配体系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⑥ 官僚制在春秋战国出现并在秦朝形成后,就牢牢地占据着中国的历史,并向东亚和周边国家传播。马丁·雅克指出:在朝贡体系中,

①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第565页。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88—89页。

③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官僚化机构要比其他古代国家完备,但出于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不认为中国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类型,反而用“家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等概念来认知古代中国。不过其论点已经遭到福山、顾立雅、许田波等学者的批评。参见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

④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8页。

⑥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第1127页。

处于“大中华圈”的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最深，特别是文字书写体系、儒家文化及中国的治理和官僚模式”。^①

中国官僚制最终传播到欧洲。欧洲官僚制是欧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学习借鉴中国、内外因共同作用的产物。福山称之为“姗姗来迟的欧洲建国”^②。美国历史学者唐纳德·F. 拉赫详细分析了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印象、作用，其中专门提到中国。他的研究显示，16世纪欧洲人曾经全面考察、高度赞赏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形态、治国技术和社会管理，并注意学习借鉴，为其所用。欧洲人称中国为“中华帝国”“中央帝国”“中国（China）”“契丹（Cathay）”，视为不同于欧洲的伟大政治实体，中国规模的巨大、中央集权国家模式、官僚制、皇帝的权威、考试制度、无贵族的社会、行政管理、朝贡制度、国家支持的教育制度、同质化的国族构建等都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关注。^③

17、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加深。“17、18世纪，通过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在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曾经出现过长达一百余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历史”^④。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对中国的制度、文明充满溢美和向往，在《风俗论》中对中国的制度、文明、文化、法律和历史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中华文明远比欧洲发达，中国国家治理是人世间的崇高典范。^⑤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瓦斯·魁奈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极度欣赏，借鉴中国经验，创立重农学派。历史学者张国刚指出，18世纪奥地利王子、法国王储学习中国皇帝，在大臣陪同下开展非常隆重的“籍田”仪式，在当时的欧洲学习中国、“走开明专制的中国道路”是很酷的事情。^⑥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在17世纪，欧洲“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机关迅速发展并日趋合理化，常备军建立并扩大，税收制度得以普及和完善。1600

①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

②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290页。

③ 唐纳德·F. 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二册），胡锦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419页。

④ 谈敏：中译本序，见弗朗瓦斯·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⑤ 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90页，第239—251页，第252—259页。

⑥ 张国刚：《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40—242页。

年欧洲还是中世纪政治的天下，到1700年就已成为民族国家的近代世界了。”^①这其中就有中国的影响。美国历史学者斯特雷耶说：“从某种程度上说，1100年之后产生的欧洲国家结合了帝国和城邦的力量。”^②他这是委婉承认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借鉴了包括他多次提到的“中华帝国”在内的帝国的力量。芬纳认为中国最早出现了受过专门训练的、领薪酬、按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官僚阶层，虽然欧洲人的确可以说是“二次发明者”，但这项发明权依然应该属于中国。^③欧洲的“二次发明”其实是借鉴中国的结果。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形成都受到君主官僚制国家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五 结语

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先行者和典范。周朝有国家治理甚至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践，但以贵族专权、血缘至上、阶级固化、官职世袭等为特征的分封制国家形态最终失败了，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取得成功。中国或许不是最早实现中央集权统治的，但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创造者。这种国家形态曾经辐射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口，延续了2133年，成为19世纪之前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形态，也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国家形态之一，在世界政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以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创造力，使得中国和东亚成为世界历史上长期处于先进状态的地区，成为世界伟大的文明中心。它的出现是世界中国化的起点。最重要的是，君主官僚制国家包含大量现代元素，中央集权、大一统、郡县制、官僚制、律法统治、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直接统治、高社会流动、平等性、同质化民族构建等，是同时代所有国家形态中最具有活力也最接近现代国家的国家形态，从而对于世界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时受到了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强烈示范和推动作用。君主官僚制国家深度印刻在世界政治进程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人类现代国家构建绕不开的“古老原型”。

①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② 约瑟夫·R. 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华佳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③ 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出现，是中华文明飞跃式演进的产物，是中国国家形态演变逻辑的产物，非一人之力，也不是偶然的。其顽强的生命力绝不应该视为可恶的“超稳定结构”或者是停滞不前，更不是东方专制主义。君主官僚制国家还有法律化管理、精准管理、标准化管理等特性，这些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影响。

当然，君主官僚制国家也有其缺陷，即皇帝集权可能助长个人专断、法治的脆弱性、民众参加政治的被动性等，并且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忽视国家基础能力的构建，逐步变成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些缺陷必须正视并克服。中华文明正是在继承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的优点、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前进的。今天的中国与西方的竞争，绝不单单是政治力量的竞争，更有文明的竞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史，是中国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人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雄厚家底。

君主官僚制国家的世界史地位和影响，展现了古希腊罗马政治学并不代表人类的全部，尤其不能代表东方，它甚至只能代表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展示了西方中心主义不可取，人类政治学说、国家形态史需要重建，言必称希腊、以西方为标准并不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态度；展示了世界历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以及世界中国化问题；也展示了人类政治演进道路、人类通向现代化道路绝不只有西方一条，世界现代化史需要更新。秦朝率先完成了国家机器、社会和阶级结构的现代化，飞越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座和第二座珠穆朗玛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生产力，这是朝贡体系、中华世界体系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君主官僚制国家并没有完成后三座珠穆朗玛峰的翻越，这是它的一切缺陷的源头。

西方借鉴中国，在16世纪以来完成了国家机器、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并比中国更早在国家与人民关系现代化、国家统治方式现代化、经济形态现代化上取得革命性突破，率先翻越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座珠穆朗玛峰，基本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五座珠穆朗玛峰的全部翻越，中国变成落后者。落后的中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付出沉重代价，受到严重刺激的中国启动现代国家构建，并为更高水平地翻越现代国家构建的五座珠穆朗玛峰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